

坚不可摧的中国力量

纪念唐山大地震40周年

■新华社评论员

一座城市的劫难与重生，包含着无尽悲欢，也见证着无数奋起。从曾被西方媒体预言“将从地球上被抹掉”的满目疮痍，到今天奋翅于冀东沃野的现代化城市，唐山40年的沧桑巨变，镌刻着一座城市凤凰涅槃的发展奇迹，诠释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伟大力量。

历史不会忘却灾难与悲痛，也永远铭记那些宝贵的生命、不屈的脊梁。40年前，当里氏7.8级的大地震猝然降临，“地光四射，地声轰鸣，房倒屋塌，地裂山崩。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化为墟土，24万城乡居民毁于瓦砾……”那一刻，生命何其脆弱。转瞬之间，生死两隔；永别亲人，痛何如哉！那一刻，生命又何其坚强！无论是废墟下救出的幸存者，还是带着伤残坚持“活下去”的唐山人，他们直面人生最大的痛苦，用顽强生活告慰逝者，用生命的尊严与努力写下一个个大大的“人”字，刻印在民族记忆深处。

强烈地震摇动着大地，却撼不动唐山人抗震救灾的坚定信念，挡不住祖国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磅礴暖流。14万解放军、5万多名干部和工程技术医务人员、

数十万吨物资驰援唐山，10多万建筑工人参与重建……同舟共济、携手抗灾，从废墟中挺立，于灾难中崛起。无论是创造“大灾过后无大灾”的奇迹，还是让4000多名地震孤儿有了新家，重新体会到父母之爱的温暖，或者是快速高效的重建成就，无不彰显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越性，无不见证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排忧解难的为民情怀。

震后不到半个月，重建唐山的规划开始启动；震后一个月，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河北1号小区开工；1986年6月底，唐山重建完成，同年底，98.5%的居民搬入新居。“我姓的这个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党”——这是“唐山孤儿”感恩的心声。“社会主义拯救了唐山”——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唐山人民至为深切的感觉。在唐山市中心，高高矗立的抗震纪念碑由4根直指苍穹的混凝土碑柱组成，犹如伸向天际的巨手。正是因为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支撑、人民的团结奋斗，唐山才能驱散地震阴霾，开启重建进程，实现奇迹般的崛起。

时代总在记录前行的探索与艰辛，把那些奋进的身影刻写在史册之中。40年来，唐山人靠实干苦干，一砖一瓦打造文明现代、繁

荣美丽的新唐山。无论是立改革潮头重振工业重镇雄风，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转型发展，改革开放始终是唐山发展的不竭动力。近年来，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唐山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勇于面对传统产业结构过剩的结构性问题，着力破解“一钢独大”的“黑色产业”面临的“蓝色困境”，壮士断腕、弃“黑”转“绿”，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探求发展新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格局中找准定位、顺势而进，进行着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新的凤凰涅槃。从震后仅两个月修复的“抗震号”机车，到今天制造时速487公里的“中国第一速”动车，从曹妃甸由荒岛变成产业重地，到百余年形成的采煤沉降区蜕变为2016世界园艺博览会会场，唐山人民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交出应对挑战、无愧时代的发展答卷。在一片废墟中浴火重生、巍然屹立的唐山，是“中国梦”的生动样本，恰如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百废待兴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个缩影。人间万事出艰辛。锐意改革的奋进力量，让这座自强不息的城市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充满自信地走向未来。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比钢筋混凝土更坚固的，是无

坚不摧的精神力量。从“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唐山抗震精神，到唐山人在全国不断“寻思”的足迹，从唐山成为“留住雷锋的城市”，到汶川地震废墟上默默奉献的燕赵儿女，再到充满感恩情怀和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精神的新唐山人……在时代发展中磨砺的唐山精神穿越时空、代代相传，伴随物质重建的进程，精神重建的图景同样令人振奋。历经磨难、不忘初心；饱尝艰辛、奋发图强，这是一座英雄城市屹立不倒的精神力量，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愈挫愈奋、多难兴邦的精神密码。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前行。走进今天的唐山，高楼林立、通衢如织，翠荫夹道、景色如画，让人流连忘返。斗转星移，从历史大悲中走出来的唐山人民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唐山不失为华夏之灵土，民众无愧于幽燕之英杰，虽遭此灭顶之灾，终未渝天日之志。”屹立不倒的唐山人民，必将继续书写发展的新传奇。砥砺前行是中华民族，必将在复兴之路上迎来更为光明的前景。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在镜头下执法』 重塑执法理念

朱昌俊

查验身份证时执法对象不配合怎么办？执法时受到阻碍如何处理？针对基层一线民警在执法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近日公安部举办全国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对全国百万民警进行集中培训。公安部首次通过视频把一线实战搬上屏幕，给全警上了一堂执法课。

从现实看，明确在警察执法时，民众有拍照的权利，其实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一方面，随着民众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增强，对警察执法过程拍照，已是执法对象和社会民众的习惯性反应。因而，针对屡屡出现的因“拍照”而起的执法冲突，相关部门确实需要对此做出权威裁定。另一方面，在“人人有镜头”的时代，警察执法时遭遇拍摄，在某种程度上已是无法避免。所以，在这些社会和时代背景下，以积极的心态看待民众的拍摄行为，无论从重新建立警权的公信力的角度看，还是从尊重民众的权利的角度看，都是明智而务实之举。

不过，尊重民众的拍摄权利，让警察习惯在镜头下执法，还只是第一步。与其说这是一种执法细节和规范的要求，不如说它更大的意义应该是指向一种新的执法理念的重视。在过去，我们似乎习惯了警察权威的“与生俱来”，甚至接受了执法过程的“神秘性”。但在今天，随着执法规范要求的提高和民众权利意识的发育，警察执法公信更多需要通过具体而规范的执法程序来建立。比如，执法者和执法对象，在原则上应该是平等的，执法者必须保障对执法对象基本权利的尊重，执法过程也应是去神秘化、可监督的。若还将民众的拍摄当作一种对执法权威的冒犯，显然已经严重过时，只会带来警民关系的紧张，也无异于执法规范的真实起点。

执法过程接受民众的拍摄和监督，其实际与执法的标准化、专业化、阳光化有着同一价值指向，即通过规范警权来重塑警察队伍的公信力和实现执法权力的可监督。在现实中，因执法过程不够透明、程序存有争议，而影响警民关系、自伤执法公信力的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它既导致警方无法自证清白，民众容易建立一种习惯性的质疑情绪，也给警权的真正规范增加了难度。而拍摄执法变为常态化，无疑是化解这种尴尬的最有效和低成本途径。从长远看，它应内化为警察执法理念的优化，比如视民众的监督为正常，而非敌意；敢于接受监督和审视甚至是挑剔的眼光，从而自觉增加对标准化、程序化执法的价值认同与遵守。

“习惯在镜头下执法”，就是要使警权习惯被监督，习惯被约束，习惯与社会建立良性互动，建立良好的执法信息披露机制，以积极心态看待监督。长远看，这有利于建立更加健康的警民关系，实现真正的警民和谐。

温情执法彰显法治之本

陆颖

最近，在南京工作的汪先生到安徽桐城六尺巷参观，因停车不当接到了一张罚单。不过，这张罚单既没扣分也没罚款，而是提醒他“前面有停车场，下次注意。”汪先生深受感动，他在微信朋友圈晒出这张罚单，表示深受教育。

尽管有人认为，这种执法方式“有欠公平”，甚至有“法外施恩”的成分，可能对其他车主不公。笔者倒以为，被从重处罚了，看到温情执法也感到不公，这只能证明公平只是相对的。在执法者能够进行自由裁量的范围内，推行温情执法还是应该提倡的。它至少让人们看到，执法者并非一定要高高在上。面对违法对象，特别是像外来者不太熟悉环境而出现停车不当这种轻微违法，以一种教育警示的形式温情执法，完全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温情执法并不等于徇私枉法，而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面对可供选择的执法手段、执法方式，选择更加人性的一端，让人们感受到法治的温度。执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凸显执法者的地位，而是在于纠正违法行为，警示违法者，进而起到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些年来，不少地方存在“钓鱼式”执法、粗暴执法甚至野蛮执法，造成执法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紧张对立。个别执法者的不文明行为，甚至给民众造成了错觉，认为执法不公普遍存在，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公信力。

以分类指导为原则，按照违法的性质，对违法行为、破坏程度等进行相应的有区别的处理，是法治的根本原则。纠正野蛮执法，针对危害轻微的违法行为，放弃从重执法、执法经济的执念，实施人性执法、文明执法，重视执法的教育和警示作用，才能强化人们的法治信仰，筑牢社会群众信任、守信的思想根基。长远看来，温情执法更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建设和维护。

勿让“包打听”扰乱政治生态

新华社记者姜伟超

甘肃省纪委日前印发通知，对违规打听、过问纪检监察工作人员执纪问责或查办案件情况，甚至欲施加影响进行干预的，将如实记录并报告备案。这无疑给那些“包打听”干部的耳朵和嘴巴上加了一把锁。

官场“包打听”由来已久，打听的领域也不仅限于纪检监察。有的四处打探组织人事动向，有的喜好收集领导的背景传闻，有的则热衷揣测中央决策部署。所有“包打听”都乐于开个“路边社”，架个“小喇叭”，散布小道消息。这些“包打听”为了更多地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上蹿下跳、四处串联，搞得单位小道消息满天飞。

“包打听”干部的种种不良做法折射出他们投机取巧的心态。无非是“混”成个耳朵长嘴快的“明白人”、胳膊长腿快的“能人”，四处钻营，占便宜、捞好处。“包打听”的危害性不言而喻。他们把大部分精力用到打探消息、传播闲话上，自然没有多少心思来想问题、干工作，而且一些传闻和所谓的内幕在他们口中添油加醋地传播，混淆视听，不仅弄得本单位乌烟瘴气，还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本质而言，“包打听”反映出这些人政治纪律涣散。那些热衷于打探消息、得到一些所谓内幕消息就到处私下传播的党员干部，其腐蚀性、涣散性是非常严重的，必须依纪依规严肃处理。

甘肃省纪委严防“包打听”的通知出台，无疑再次给此类干部敲响了警钟。眼下，地方换届有序进行，这个时候各路“包打听”往鑫鑫而动，各方各部门务必严肃政治规矩、严格政治纪律，不给那些“包打听”们以“一展身手”的机会，全力维护风清气正、人心思进的政治生态。

新华社兰州7月27日电

乐见官员为地方发展而“秀”

郭奔胜

前不久，一档名为《人说山西好风光》的电视节目备受关注。节目组把山西省11个地市的主官请到了节目现场，让他们以演讲、PK等方式介绍各地的旅游资源，并把评判权交给了场内外的观众。山西的特殊省情、领导干部、电视镜头、演讲、竞争、真实有效的结果，这些元素叠加到一起，让这档节目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极具眼球效应和传播力。联系到今年以来出现的几起干部以上网推介的方式为地方经济发展吆喝的典型做法，有人把这类现象称之为“官员真人秀”。

从舆论的总体态势看，社会对这样的“官员秀”现象持支持态度。大家看重的是这些干部为了公众利益、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走到镜头前来秀智慧、秀胆识、秀口才、秀热情，同时，大家也对这些领导干部敢于改变“千人一面”刻板形象、大胆塑造新形象的魄力“点赞”。应该说，这对于鼓励更多的创新和尝试是个利好。

正如社会期待的那样，官员“真人秀”不应该是昙花一现的风景。现代文明社会，但凡公职人员都应该有基本的工作范式和良好的公共形象，尤其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在履职行为上有模有样。但是，基本的范式、统一的要求和严格的规矩，并不排斥具体工作中的方法创新和个性彰显。事实上，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具有创新精神和自我突破能力的干部大有人在。当前，要创造条件，让这些干部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创新潜能和创造活力。

其实，像《人说山西好风光》这样的“秀场”，还可以再多一些，还可以办得再好一些。当前，各地都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发展中的挑战，既有共性的问题，也有各地的差异化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不能指望领导干部上一两次电视、发表一两次演说就能解决，还是要靠带领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艰苦奋斗来一切。但是，这并不排斥领导干部利用一切有利于凝聚共识、提升信心、整合资源的办法来推介自己所服务的地方。

从巩固干群关系这个维度来看，领导干部走到电视、网络等这样的公共平台与



更广泛的群众直接交流，让更广泛的受众了解自己所在地区的发展现状，越来越成为一种很有必要的新方式。干群之间，不是简单的点与点关系，而是点与面、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从县区以上情况来看，当地主官在工作中直接接触到群众毕竟有限，更多的群众是要通过媒介传播，当地经济社会的变化来感知、评判领导干部的表现和作为。

除了这种间接方式外，领导干部可以通过电视问政、网络问政、新媒体朋友圈等方式来直接与群众进行互动，少一些会场里的闭门决策，多一些网络里的公开问政，社会其实也希望这样的电视秀、网络秀、问政秀多一些，再多样些。

社会看官员“真人秀”，其实不是只图看热闹，而是看重这种公开形式背后的官员执政逻辑：你说你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么你的执政行为、决策行为是否科学、公正，通过官员与群众之间的直接互动可以略知一二；你站到电视镜头前、广大网民前为地方代言，为发展经济助力，行为的社会公众理应是清晰的，是必须经得起社会检验的；作为地方主官，暴露在聚光灯下和电视镜头里，不是为了秀颜值，而是秀执政智慧、发展思路和为民情怀等。所以，一个通过严格程序设定、赢得受众口

“高校拆墙”传闻引出真问题

本报评论员刘晶瑞

试点工作要充分倾听利益相关方的心声、做好相关配套工作、解除后顾之忧之忧，如此才能让“街区制”改革蹄疾而步稳

如今“高校拆墙”的传闻已被辟谣，但从网络舆情中可以看出推广“街区制”的阻力何在。比如，在几所高校传出“拆墙”的消息后，很多学生、教师表达了他们的担忧，比如害怕校园开放后将不再安宁，也担心激增的社会车辆给师生出行安全带来影响；还有一些网友表示，即便要试点“街区制”，也应该让其他更有代表性的单位“做表率”。

“街区制”是一种新的模式，人们对这种改革有一些担忧，完全在情理之中。但客观来说，很多高校尤其名校附近确实是令司机头疼的“堵点”，一些占地面积大的高校更是让道路格局极不合理。因此，对高校周边区域的路网进行梳理，打通可能的支路，探索道路微循环，的确有一定的必要。而且从国外经验来看，知名高校几乎都没有围墙，这

或许是中国高校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事实上，国内大城市交通“肠梗阻”问题遭诟病已久。究其病根，城市建设规划布局不合理难辞其咎。从城市建设理念来看，无论是居民小区、政府机关，还是高校、医院，在修建的过程中大都延续了旧时代的封闭式理念，人为地割裂了社区之间的沟通，各种“大院”阻道层出不穷。由此衍生的“丁字路”“断头路”更让交通运行的“血流”不畅，很多司机只能无奈地“面墙叹息”。

让城市的道路更通达，疏通顽固的交通“堵点”，不但能够提高通行效率，也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这一点上讲，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但具体到应该先拆谁后拆谁，还需要科学论证、统筹安排。不过，此次“高校拆墙”传闻其实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推广“街区制”，高校是否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突破口？

诚然，高校人流量大，完全向社会开放会增加安全隐患，但换个思路想想，在修建的过程中大都延续了旧时代的封闭式理念，人为地割裂了社区之间的沟通，各种“大院”阻道层出不穷。由此衍生的“丁字路”“断头路”更让交通运行的“血流”不畅，很多司机只能无奈地“面墙叹息”。



寒门博士

张松超

前不久，我与导师和几位师兄师姐一起吃饭，遂到今年毕业的几个硕士师姐。在谈到各自的理想和未来规划时，一个博士师姐突然哭了出来，我们都吓了一跳。大家安慰她说：“没事啊，以后还会再见的，不用太伤心。”没想到师姐却说：“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位博士师姐今年刚读博一，硕士也是在我们学校读的，属于把本硕博一气呵成读完的情况。她的职业理想是毕业后去高校做老师，但按照当下的就业门槛，必须先读博。师姐说自己压力很大，而且很愧疚，然后借着一醉解千愁，把读博一年来的憋屈都说了出来。

关于博士生群体的压力，我们听过身边的例子和媒体报道，多多少少都有所了解。像师姐那样连续把本硕博学位全部拿下的人，压力之大更是可想而知。比如，同龄人的小孩都会打酱油了，事业也渐有起色，这会让学生觉得自己在远远落后于同龄人；即便以后去了高校做老师，青年教师的收入和考核压力依然不小。

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师姐说读博让她很愧疚，主要与她的家庭情况有关——师姐家在农村，家庭条件并不好。当然，这不影响她顺利地读博士，因为学校每个月发的2000多块钱补贴，也完全够她花了。但她说，只要自己还没工作、结婚，在老家的父母就会不停地“做工作”，把这两件事情当成任务来完成——尽管他们年龄已经很大了，本该享点清福了。

但此时的师姐，不仅没工作，也没有男朋友，结婚更是遥遥无期。所以，她的父母一直在辛苦工作，而且赚的都是微薄的辛苦钱，师姐对此也无力为力。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才是师姐难受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师姐甚至都有点后悔读博了。

有人说，选择了读博士这条路，就应该去承担这些压力，不管你是怎样的出身。这话听起来或许没错，但我想这位博士师姐的境地，绝对不能仅仅将其当作个人问题来看待，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目的是增加路网密度，建立区域道路微循环，“不涉及任何拆围墙的事”。

优化高校周边路网结构，被很多人误读为“拆墙”，原因并不难理解。从今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广“街区制”的设想，公众关于这项改革如何落实的讨论就一直没停过。今年3月中旬，西城区在财政部等众多机关单位扎堆的三里河二巷开展拓宽道路工作，也曾被解读为“拆墙”。



近日，一则“北京将在人大、北航等高校试点拆墙”的消息，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引发热烈讨论。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随后回应称，推进高校周边区域路网管控，梳理有可能与地区道路相连的支路、次路或“断头路”，目的是增加路网密度，建立区域道路微循环，“不涉及任何拆围墙的事”。